

The Postmodern Turn

Copyright © 1997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by arrangement with Mark Paterso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2-0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转向 / (美) 贝斯特, (美) 科尔纳著; 陈刚
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宾主编)

ISBN 7-305-03916-0

I. 后... II. ①贝... ②科... ③陈... III. 后现代
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089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后现代转向

原 著 者 斯蒂芬·贝斯特 道格拉斯·科尔纳

译 者 陈 刚等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48 千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3916-0/C · 119

定 价: 25.00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1
- 序言与致谢 3

第一章 后之时代 1

- “后”的出现 3
- 后现代转折点:80 年代以降 12
- 从现代到后现代 18
- 后现代话语:某些概念的澄清 28
- 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36

第二章 通向后现代之路: 46

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

- 克尔凯郭尔,大众社会与通向后现代之路 49
- 马克思与对抽象的理解 63
- 尼采与现代性 71
- 尼采的继承者 90

第三章 从景观社会到类象王国: 100

德博尔、鲍德里亚与后现代性

- 境遇主义者:商品化、景观和资本主义 102
- 鲍德里亚:真实的消亡 120

● 商品化的本质:政治经济学和后现代	131
● 走向批评的解释学	139
● 尾声:德博尔的瓦解	150
第四章 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拼凑、内爆和流行	157
●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159
● 建筑中的后现代阶段	177
● 绘画中的后现代转换	212
● 后现代艺术的变迁	233
第五章 后现代科学:熵、混沌和有机主义	256
● 现代科学的世界观	258
● 热力学、熵和进化:后现代科学的诞生	267
●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	278
● 混沌理论:非决定性和预测的有限性	285
● 转向一种后现代科学	292
● 科学战争和后现代的磨难	299
第六章 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理论与政治的范式转换	335
● 边界的跨越	343
● 生态学和后现代科学与社会理论的缺陷	350
● 后现代政治与为了未来的斗争	361
参考文献	378
索引	408
译后记	426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序言与致谢

过去几十年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它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主要范式的改变,有些人认为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的划时代转型。每一生活尺度出现激动人心的变化和骚动都会使一些人声称我们已离开现时代而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代。^[1]这些观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据贝斯特与科尔纳研究,1991)促进后现代话语兴旺发达,并使现代与后现代的支持者论战不已。一些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认为当代社会,以其新的技术、新的文化范型与经验形式、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与以前生活方式的彻底决裂而终结了现时代。在文化领域有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在艺术方面后现代主义迅速发展,它遍及从建筑到电影到新的多媒体制作每一艺术领域。此外,不同形式的后现代理论在学院话语领域也无所不在,它向众多领域的知识成规包括科学发起挑战,并改造之。

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后现代转向也包括后现代政治的产生、后现代认同的新形态以及文化与技术的新格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理论家声称我们已把现代性抛弃身后,我们已来到一

viii 个新的历史空间,在那里有新的挑战、新的危险和可能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正在体验历史本身的终结。

后现代转向之令人兴奋和激动在于它包含了一种经验、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冲突,即与已为人们所接受思想和行为模式斗争并且提供观察、写作和生活的新方式。后现代转向放弃了常见的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认为是安全可靠的支撑点,而要求进行一次到新的思想和经验王国之远行。它包含介入新兴形式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以及迎接一种广泛的全球化经济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到来。的确,后现代转向是全球性的,涵盖几乎全部世界,从学院派和先锋文化圈到传媒文化和日常生活,以致成为现时代一个特有方面,尽管意见高度不一。

虽然许多人起初仅把后现代转向视作一种时尚,预言其几年后就会衰亡,但后现代话语仍然在蓬勃发展,它赢得了热心的支持者也激怒了反对者,从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因此术语“后现代”很快被视为当代社会转折的同义语,以及描述其不同于现代文化和社会的新颖处之标志。然而构成后现代的是什么,我们是否确实处于一个新的后现代时代,或者什么样的理论能够最好地说明此时此刻的动力与经验,全部莫衷一是。因此,在这里以及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探寻那许多蜿蜒曲直相互交织的通往后现代之路径,探讨一些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已进行后现代转向的理论话语。

因此我们将探询和分析后现代转向的某些特定时刻,以试图阐释我们的当前处境。我们的目标是质问在理论、文化和社会中那些主要的转型,以洞察从现代到后现代的通道。我们把社会理论与文化批评结合起来以助于写出“当下的历史”(米歇尔·福柯)与发展“一种当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斯·霍克海默)。我们相信探询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向需要作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考察,即把当下时刻与其从之而来的过去与将参与其中的未来联结

起来。

我们第一章关于后现代概念领域的入门,对后现代转向的轮廓作了初步的描述,并解释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争端和问题,对之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第二章,我们探讨一些作为后现代理论重要来源的 19 世纪思想家如索伦·克尔凯郭尔、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尼采,我们将显示这些理论家如何影响后现代转向的现代形态,并阐述我们的观点即后现代话语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现代理论及其发展中有着预兆,因而有着复杂的历史。在第三章我们探索从德博尔国际境遇主义者到让·鲍德里亚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这样一条通往后现代的重要道路。德博尔与环境决定论者在消费与传媒社会的背景中更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从而提供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联系并影响到鲍德里亚的作品,博氏则是最早和最出色地描述一个新的后现代时代的人之一。 ix

在对后现代理论的某些轨迹作出这些分析之后,第四章探讨后现代文化在文学、视觉艺术和建筑方面的起源,并考察艺术领域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运动。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图像和景观中,文化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发展文化批评理论,以质询这种文化技术领域的过渡之意义、影响与结果。

第五章分析后现代科学领域的发展,这种发展构成与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决裂。特别是,我们认为从现代科学到后现代科学的过渡是通往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路径,考察熵与混沌的概念在理解当代科学话语方面是如何重要,还有对有机论、生态学和作为整体的宇宙作新的理解以及对误读的支配自然的现代构想产生疑问。与这些改变平行的是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哲学与艺术领域的发展,这些相似之处促使我们在第六章探询一种新的后现代范式之轮廓。在这个总结性的

一章,我们论断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理论和社会领域,后现代话语则力图清楚地把之表述出来。

如今,关于描述后现代转向有很多系谱,很多叙事和很多方法,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先锋人物,自己特定的学科聚焦、发展道路和立场观点。没有一个后现代的系谱是中立的和没有明确目的的,对之的回应则毁誉不一,赞同者如伊亚布·哈桑肯定后现代转向,批评者有约尔根·哈贝马斯,还有一些人则强烈反对之。如我们所见,后现代转向已波及许多不同的领域,涉及多种多样的理论、艺术、人类学、科学、政治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我们将寻找通过这些复杂事象的路径,探索后现代话语所关及的范围,并指出后现代吸引当代想像力的不同方式。

虽然我们已显示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后现代转向如何在某些特定方面与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的转变并行不悖,但我们仍然要指出在理论、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后现代话语有着差异,其本身范围也不相同。因此
X 每条道路都有特点,每个领域关于后现代转向都可以有不同的论述,关于如何描述特定领域的后现代有着激烈的争议,更一般的领域也一样。但尽管有这些差异和争论,我们仍希望显示有一个共有的后现代话语,有共同的视角、明确的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新生的后现代范式。

我们如何追溯后现代的系谱有助于确定我们如何看待当代社会,我们对复杂多变的当代历史之看法,对现时代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预期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是简单化了的还是错综复杂的。因此,重要的是有很多系谱学以及很多种见解,以获得关于后现代的动态的和复杂的看法,从而领悟发展路线的连续与中断、前进与倒退。

我们自始至终的目标是勾勒在众多领域的后现代转向之

轮廓,显示那些互不相干的后现代轨迹如何尽管有差异但却结合成一个新的范式,我们认为它是新生的,虽然还不居支配地位,因而有着激烈的争议。正如托马斯·库恩所定义,一种“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假定的“格局”,不管它是隐而不露还是显而易见的,均内含在更为广泛的世界观中。库恩发现整个科学史都存在着范式的变化、概念的革命,它们由全新的假设、理论和研究范式所引发,而使那些占支配地位的主张陷入危机之中,最终出现瓦解和中断性的改变。库恩认为,在科学中一种既定的范式在另一种似乎更有解释力的范式取代它之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在任一时代和任一特定学科均有一定的设定和方法流行,直到它们受到一个新主张的挑战并且被其压倒,该主张通过对现状提出一个决定性的挑战而出现;如果成功,这个新的主张就居于支配地位,成为新的范式,其本身也得准备受到另一个强有力的挑战,因为理论设定仍继续处于变动不居之中。

库恩的注意力限于科学范式,但显然可能存在一种适用于任何理论或艺术领域的范式,也适用于一般意义的文化,例如福柯(1972)试图通过他的知识概念认识现代知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当我们把术语“后现代范式”概念化时,它既意指当代每一个实际的理论学科和艺术领域的特殊变化也意蕴把这些变化与更大范围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因而影响到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与社会,还有日常生活的价值与实践。我们希望把范式的改变置于一定的背景中,不仅置于思想史之中如库恩及其他一些人,而且作为社会与习俗方面的因素发展的结果来加以研究,该发展受到工业、技术、经济、政治以及常常是科学本身的变化所推动。因此,我们分析范式改变既是某一特定的概念范围之内内部回应,也是潜在的和不言而喻的“知识的规则”之改变,例如早期的福柯试图在人文学科的范围

xi

内认识激动人心的概念断裂;同时又把之作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历史变化的组成部分,因而影响到文化与思想的变化。哲学、艺术、文学与科学有自己的历史、问题、争端和概念动力学,但是它们也深受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限制,无论人们承认与否。

因此我们对特定领域的“内部”和“外部”之变化都将作出考察,既避免把思想归结为经济或技术力量的社会决定论,也避免未能把复杂的知识变化理解为更大的社会范型与运动之组成部分的唯心主义。因此,在我们看来,后现代范式的改变在不同领域均是作为对那些被认为僵硬、教条、错误或压抑人的思想与方法之批判性回应而产生的,同时也是对社会、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之回应。在第一章,我们着手勾勒如今仍有广泛争论的现代范式之特征及一些概念上的差异以阐述后现代范式某些确定的特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描述理论、艺术、科学和政治学领域中新出现的后现代范式。我们清理那些赞成与反对后现代理论的主张,并提出我们的立场,即我们当前的时代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因此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都有意义,需要有新的综合与跨学科的探讨以把握复杂迷乱的当前事象及发展。

我们将紧随我们以前的著作《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Best 和 Kellner, 1991),该书质疑从福柯到杰姆逊等现已被视为经典的理论家的后现代话语,本书的研究将补充并超越前著。在作此番肯定之后我们将着手收集一些已单独或合作出版的有关后现代文化和理论的文章。我们接着修订所有这些文字,增加新的思想,并作进一步的合作研究,所以现在出现的这本书,如我们的第一本书一样,作为一本合著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描述了我们对于当代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共同观点。我们在一个跨学科的空间里工作,就社会理论、哲

学、传媒文化、绘画、建筑、文学、科学技术和政治学领域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话题表达了批评性的意见。该版本反映了我们的关于社会现实能够通过多种方法和理论视角得到最充分分析的观点。以新近的著作即科尔纳的《传媒文化》(1995)与贝斯特的《政治学的历史视野》为基础,我们力求在后现代理论和当代社会文化方面提出新的见解,我们认为它处于现代与某些新的东西之间的边缘状态,术语“后现代”的发明正用于此。给这个经常被滥用和误用的概念提供其实质上的意义,是以下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2] xii

我们感谢 Carl Boggs, David Hall, Rhonda Hammer, Darrell Hamamoto, Sandra Harting, Ali Hosseini, Fred Kronz, Valerie Scatamburlo, Steven Seidman, Peter Wissoker 阅读这些文章并提出批评意见。我们也想感谢 Jon Epstein 与 Pat Lichty 为本书作图,感谢 Lichty 的封面设计及完成插图。感谢杰富德出版社的 Judith Grauman 在编辑过程中所给予的特别出色和富有建设性的帮助。我们想再一次感谢 Keith Hay - Roe 帮助我们解决繁杂的电脑操作和文字过程中的问题,面对我们的困惑和为难却一直和颜悦色充满耐心。在互联网操作方面我们还要感谢 Jay Ashcraft 与 Robert Prescott,他们帮助我们行进在电脑世界的新领地新区域。我们要把此书献给比尔与 H. A. 贝斯特(S. B.)以志纪念,还要纪念 C. A. 与汤尼·凯尔勒(D. K.),他们在我们完成本书时去世了。

注 释

[1] 如今论述后现代以及关于后现代概念的书能装满一个小型图书馆,并且数量还在增长。它们包括鲍德里亚(1983a, 1983b, 1993[1976]);利奥塔(1982[1979]);克洛克与库克(1986);哈维(1989);特纳(1990);拉希

(1990);贝斯特与科尔纳(1991);杰姆逊(1991);鲍曼(1992);斯马特(1992, 1993);列翁(1994);伯特恩斯(1995)与里哲(1997)。

[2] 在本书写作即将完成之际,我们重新发现伊亚布·哈桑的著作《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集》。虽然我们的书与之同名,哈桑的副标题也意含对后现代范式改变的论说,但他以一定数量的趣闻轶事为据,我们的方向则完全不同。哈桑论述的特点恰是我们反对的,一种对后现代话语冷嘲热讽、淡漠超然、游戏戏谑、任性随意的态度。作为一个带有某些后现代风格的范式之例证,哈桑的书只是零散文章的拼盘,并没有阐明或界定“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的主要趋势。的确,哈桑是一个靠目录(既在名义上也在概念上)、引言、例证和晦涩暧昧的术语来“定义”的大师。因为他骄傲地宣称:“我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我也不太可能为后现代主义下定义”(1987:40)。他在许多场合求助于托马斯·库恩的名字和范式改变的概念但却拒斥之(120),除此之外对范式概念并无兴趣,他还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消失的后现代时代”(121),这就超出了任何学科的后现代转向。与之相比,我们主张承认后现代话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没有完结的特性,同时尽力去阐明和探询后现代众多的谱系、观点和风格,考察其不同的用法和滥用,还有其进步的与后退的方面。而后现代话语是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和变动不居的,但总体上并非悬而未决,不能定义或分析。而哈桑寻求离开“左派或右派的套话”,找到“一种现实和灵活的范式”与“后人道主义”(xvii),事实上,范式与人道主义在概念上与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有关联。而且,哈桑未能把后现代转向置于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而我们则认为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后现代范式改变的一个主要根源,也是今日全球社会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还有,我们追求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规范的复兴,这些规范构成了现代人与进步传统的精粹,哈桑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则想抛弃之。关键是,哈桑的参照框架主要是文学理论,连带某些哲学的和科学的典故,我们特有的视角是批判的社会理论。

第一章

后之时代

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

——米歇尔·福柯

很多人都谈到,我们生活在“后”的时代,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人道主义、后历史与后现代主义。术语“后”意指一种历史顺序,在此顺序中先前的事件被替代,因此在最初的例证中其功能是用作为历史分期的术语。关于后的话语有时与一种带有启示色彩和推陈出新的断裂感相关联。的确,已有很多人写书描写工业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在这些书中知识与信息成为社会的新的组织原则(Bell, 1976; Frankel, 1987; Poster, 1990)。其他人则认为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模式已被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的和更为灵活的生产所替代,部分的产品生产遍布

全球,部分集中于廉价劳动力地区,而导致旧的工业单位和组织崩溃,伴随而来的是工会的瓦解和大规模的地区性失业(Bluestone 与 Harrison, 1982; Harvey, 1989)。随着苏联的崩溃,一些评论家宣告马克思主义终结(Fukuyama, 1992),一些理论家如利奥塔(1984)宣布现代理论宏大叙事终结,需要新的后现代理论和政治学。

此外,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史家认为不可能再有什么重大的科学上的断裂,因为我们正处于“科学的尽头”(Horgan, 1996)。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宣布我们正处在现代性本身的尽头,现代性本身已经终结,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Baudrillard, 1983a, 1983b, 1993)。^[1]甚至有人说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尽头”(Baudrillard, 1986; Fukuyama, 1992),不再会出现什么根本的政治或历史变化,致使一些后现代论者宣称我们现处在一个新的后历史阶段,在此阶段过去的理论、政治和世界观均过时了。这种语言使以往的所有理论都成为疑问,而要求用新的理论和政治学来处理当前非常新颖之事。

然而还没有人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所有这些关于“后”的话语为何近年来如此激增和吸引人们的关注乃至热情。我们坚持认为对于后现代话语的出现没有单独的和简单的解释,并相信我们正生活在“后的时代”。而且,阐明后现代转向需要讨论“后”话语最初所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我们关于现时代的后现代转向之产生的讨论将从某些共同的曾引导了更早的 20 世纪 60 年代反叛的那些社会历史经验开始,正是它们推动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后现代话语的发展。然后我们讨论后来的“第 X 代”之经验,它们开始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后现代转向,再讨论后现代话语为何在我们当前的情境中动员了那么多热情支持和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后面的章节将对理论、艺术和政治学领域的

后现代转向作更为细致的历史分析,揭示产生后现代范式改变的基因,我们相信这种改变是现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

“后”的出现

突然,道路出现一个转弯,一个拐点。真实的场地在某个时候消失了,你曾拥有这个场地的比赛规则,以及一些牢牢竖在那儿人人都能依靠的桩界。

——让·鲍德里亚

在20世纪60年代,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经历了他们相信是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一种决定性断裂,他们成为第一批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相信随着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整体这个新的社会运动的到来出现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他们要求革命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一种对立的反文化出现了,它要求社会放弃物质主义的精神气质和资本主义以成功为导向的规范。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给人们带来希望,选择解放的理由在于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导致更平等、更公正和更民主的社会。许多人相信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已经出现,在道德、政治和概念领域的一场革命已在进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破晓。

大多数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加塔利、杰姆逊、拉康、哈维及其他一些人——都参与乃至被20世纪60年代的骚动深深影响,这些断裂的经验有助于对历史断裂和失序的话语采取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人们很难高估法国的1968年5月在产生一种与过去的断裂感、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转折点来临以及一个新的世界将诞

生之感觉方面的作用。在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暴动中,学生与工人占领了大学、工厂和巴黎的其他机构,与警察街头巷战,并迫使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离开法国以提出一项解决危机的方案。^[2]

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有着同样的经历,有学生骚乱和对越战强烈抗议,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学生于1968年春天接管哥伦比亚大学。这些事件也促使许多人相信革命已经来临,一场与以前社会与文化的决裂在进行中,新的一天正在破晓。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地方,反正统文化者也相信这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与文化,它奠立于一整套新的价值、感觉、意识、文化和制度之上,因而与社会主流或“传统体制”产生决裂。^[3]

然而,继之而来的后现代转向理论最初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它主张决裂乃是由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非20世纪60年代的群众斗争与革命动乱所引起(Baudrillard, 1993[1976]; Lyotard, 1984[1979])。而且,他们的话语,特别是鲍德里亚的,语调是悲观主义的而不是乐观主义的(参见 Kellner, 1989b),这种悲观主义植根于一种失败感。大多数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对后现代作出理论阐述和政治分析的法国理论家都对法国1968年事件误入歧途深感失望。正当学生与工人站在一起即将推翻戴高乐主义政府之际,法国共产党却为支持戴高乐进行新选举和回到正常状态而呼吁,一项共产党的决策帮助这位总统重新掌权和恢复原来状态,从而粉碎了革命的希望。

许多法国的激进分子为共产主义者对现存制度的调和态度深感愤怒,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官僚政治联系起来,而寻求新的理论和政治学。许多人为阿尔都塞及其同伴所发展出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决定论的“科学